

“印太”海洋超级安全复合体的聚合*

范佳睿

【内容提要】 当前,南海问题正在美国实施“印太战略”的背景下升级为全球热点,引发印度洋与太平洋及东南亚、东北亚和南亚等次区域主要行为体的广泛关切。以主权和航行等议题为重点领域,美国等全球性大国逐步介入这一区域并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导致地区安全形势日益复杂化。基于对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逻辑演绎,作者认为这一现象反映出以南海海域为内核、以“印太”区域为外延的海洋超级安全复合体已初步形成。驱动这一安全复合体聚合的变量包括各国的权力关系预期与地缘政治想象,前者越趋异、后者越趋同,安全议题越容易突破原有区域边界发生跨区域延展。这一态势与大国竞争加剧的趋势相互刺激而螺旋上升,是特定区域内各方的安全互动升级至全球层面的反映,也是世界大国深度介入区域安全议题的重要案例。主权议题扩大化、航行议题政治化和“印太”议题实心化是推动这一安全复合体初步成形的三个代表性议题领域,其演进态势关涉中国国家安全与亚洲和平稳定。

【关键词】 南海问题;“印太战略”;海洋超级安全复合体;国际安全;大国竞争

【作者简介】 范佳睿,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007)。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 (2024) 03-0127-29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印太战略’背景下马六甲海峡沿岸三国主导的海峡多边安全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项目批准号:23CGJ048)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与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一 问题的提出

南海问题本是一个只涉及南海海域周边国家的区域性安全议题，但在冷战后的30余年中却逐渐升级为加剧大国博弈的全球安全热点。一方面，该议题关涉的行为体增多。除当事各方外，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甚至英法等欧洲国家均参与其中。另一方面，该议题蕴含的矛盾关系日趋复杂，当事各方的领海权益争端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起的“自由航行”权益之辩交织。近年来，美国发布的安全与防务报告频频论及南海，多次将中国界定为亚太海洋空间内的“主要威胁”。^① 美国持续强化在南海海域的军事部署，逐年加大在“印太”方向的军事投入，^② 刺激南海紧张态势升温。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等小多边机制也频繁强调维护此海域的“航行及飞越自由”。^③ 无论是就地缘覆盖范围和涉及利益相关方数量而言，还是从议题本身的复杂性、重要性及影响力上来看，南海问题正在升级为一个全球热点议题。

既有研究对此问题的解释主要从三方面进行归因：一是美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及由此引发的中美结构性矛盾，二是周边中小国家的利益考量与斡旋协调，三是各利益相关方围绕国际规则、机制和秩序的矛盾互动。

第一类研究将中美结构性矛盾视为南海问题升温的主要原因，认为其主要源于美国近年针对中国周边海域安全议题做出的战略调整。王联合归纳出“美国+关

^① 参见“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访问时间：2023年9月20日；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访问时间：2023年9月20日；U.S. Department of State, “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Arbitral Tribunal Ruling on the South China Sea,” <https://www.state.gov/fifth-anniversary-of-the-arbitral-tribunal-ruling-on-the-south-china-sea/>, 访问时间：2023年9月24日。

^② 2022财年美国国会向国防部下拨71亿美元的预算授权（原计划为51亿美元），用于实施所谓“太平洋威慑计划（PDI）”，确定美国的“印太”军事投射。2023财年美国国会下拨115亿美元的预算授权，远超原计划的61亿美元，其中“印太”方向的军事投入高达64.6亿美元，亦远超国防部最初18亿美元的拨款请求。参见“U.S. 2022 NDAA Is Full of Dangerous Anti-Chinese Provocations,” http://eng.chinamil.com.cn/OPINIONS_209196/Opinions_209197/10119320.html, 访问时间：2023年7月2日；Andrew Eversden, “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 Gets \$2.1 Billion Boost in Final NDAA,” <https://breakingdefense.com/2021/12/pacific-deterrence-initiative-gets-21-billion-boost-in-final-ndaa/>, 访问时间：2023年7月5日；“The 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 A Budgetary Overview,”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January 9, 2023.

^③ The White House, “Joint Statement from Quad Leaders,”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24/joint-statement-from-quad-leaders/>, 访问时间：2023年7月2日。

键国家”“美国+南海争议国家”“开放型小多边”三种美国针对南海问题构建联盟的新形式,认为美国“轴辐”体系的扩展导致南海问题更加复杂。^①李忠林指出,美国的“印太海洋联盟”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目标会深刻影响中国的海上安全环境。^②中美结构性矛盾的本质是两国海洋安全观的差异。何奇松认为中国旨在维护国家安全及可持续发展,美国力图维系霸权地位和绝对安全,这种差异可能诱发两国竞争,使南海安全受损。^③美国的这种对抗思维在“航行自由行动”上得到鲜明体现,刘琳将其归因于美国反对中国南海岛礁建设、塑造法理实践先例以及向盟友兑现承诺等目的。^④这种结构性矛盾会增加地区安全议题跨区域延展的可能性。

第二类研究强调南海海域周边中小国家基于不同利益考量的斡旋协调。首先,东南亚国家与东盟将南海议题视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关键。曹云华和张彦认为,东南亚国家塑造弱者海权的方式是发展海洋力量保护海洋安全并行使海洋权利,避免冲突的方式则是形成小国主导的开放海权观。^⑤田诗慧与郑先武认为,亚太海洋安全合作是东盟利用关系性权力突破霸权支配构建中心地位从而主导区域海洋安全关系的实践。^⑥其次,东盟斡旋及区域话语权的建立为弥合中美南海分歧提供了契机。贺嘉洁将东盟在海洋合作中的安全化或去安全化策略视为维护区域合作中心地位及对大国地缘战略竞争的回应,以避免域外大国主导地区秩序。^⑦阿尔芬·苏迪曼(Arfin Sudirman)强调东盟在南海问题中作为地区调解人和独立谈判者的中立性与中心性。^⑧刘若楠认为中美之间的分歧给东盟的斡旋协调提供了时空条件,东盟国家协调立场、弥合分歧的“自我修复”式努力能够弱化成员国之间战略分化带来的国际政治结果,为该组织在地区秩序中继续发挥关键作用提供

① 王联合:《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下针对南海问题的联盟新样式》,载《国际观察》,2021年第1期,第106—130页。

② 李忠林:《美国印太海洋联盟的构建、影响与中国的对策建议》,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2期,第153—160页。

③ 何奇松:《中美海洋安全观视角的海洋安全博弈》,载《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9期,第47—57页。

④ 刘琳:《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探析》,载《当代美国评论》,2018年第1期,第84—97页。

⑤ 曹云华、张彦:《东南亚国家“海权观”的建构和变化分析》,载《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3期,第4—10页。

⑥ 田诗慧、郑先武:《关系性权力与亚太海洋安全合作“东盟中心地位”构建》,载《当代亚太》,2022年第6期,第98—133页。

⑦ 贺嘉洁:《东盟海洋合作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载《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4期,第66—86页。

⑧ Arfin Sudirman,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in ASEAN: Neutrality and Centrality at Brink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Journal of Indonesian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Vol. 7, Issue 1, 2017, pp. 43–54.

保障。^①

第三类研究认为，南海问题升温源自各利益相关方在规则、机制和秩序等方面存在的复杂互动。在国际力量结构层面，吴士存将南海视为大国在规则创设、力量对比和安全架构塑造等领域竞争的试验场，认为域外国家介入会增强南海问题的复杂性。^② 在域内外国家间关系层面，刘衡认为受中美欧三边关系复杂互动的影 响，欧盟有条件地附和美国南海政策是为了确保自身在南海的利益不受海权再分配的负面影响。^③ 在区域性的规则制定和秩序塑造层面，丽贝卡·斯特拉廷 (Rebecca Strating) 将该议题视为东亚安全整体秩序内部的微观系统，各方的竞争主要围绕区域安全秩序及制度、规则和法律展开。^④ 在区域组织的能动性作用层面，苏迪曼指出东盟应适应新的国际体系原则，在南海和东南亚地区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⑤

上述研究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南海问题升温的原因。围绕大国结构性矛盾及中小国家利益考量的两种归因路径本质上是将南海问题视作权力博弈的外在表现，二者各有侧重、互为补充。以南海议题在国际规则和秩序层面的变迁为线索开展研究，则是将不同层次的利益相关方视为这种变迁的干扰因素，与上述两种路径切口不同、互为表里。这些研究的共同问题是仅仅将南海问题视作地区安全热点，偏重特定维度分析态势演进的原因，未能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出发将全球层次的大国竞争与区域层次的议题升温结合起来，挖掘其内在作用机制及学理价值。近年来，美国等域外大国展现出通过推动地区安全热点议题发酵扩展势力范围，维系自身霸权的新态势。若以单一维度理解地区安全问题，则无法切中当下全球安全环境恶化的根源性因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破解路径。本文旨在探索地区安全议题升级与全球性大国竞争加剧的双向刺激机制。具体而言，特定地区安全

① 刘若楠：《应对南海危机：东盟“自我修复”的措施及限度》，载《外交评论》，2018年第4期，第25—53页。

② 吴士存：《南海缘何再度成为大国角逐的舞台》，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3期，第16—27页；吴士存、胡楠：《美国航行自由行动体系与遵约议价模式研究——兼论对南海形势的影响》，载《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4期，第104—116页。

③ 刘衡：《海权再分配视角下的美欧对华战略协调与东盟南海政策变迁》，载《当代亚太》，2021年第6期，第102—130页。

④ Rebecca Strating, “Maritime Disputes, Sovereignty and the Rules-Based Order in East Asia,”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Vol. 65, Issue 3, 2019, pp. 449-465; Rebecca Strating, “Norm Contestation, Statecraft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efending Maritime Order,”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5, No. 1, 2020, pp. 1-31.

⑤ Arfin Sudirman,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in ASEAN: Neutrality and Centrality at Brink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pp. 43-54.

议题会在大国竞争加剧的时代背景下突破区域边界，促发囊括多个邻近区域的超级安全复合体形成，推动地区安全议题的跨区域化，吸引全球主要大国参与其中，使地区安全议题升级为全球热点议题。在这个过程中，各大国对地区的权力关系预期越趋异，旧的复合体结构越容易打破；各大国对地区的地缘政治想象越趋同，新的复合体构型越容易形成。二者共同导致更多域外大国渗透甚至卷入特定地区安全议题，促发超级安全复合体聚合和固化，推动这一地区安全议题的跨区域化进程。

实际上，南海问题本身并不复杂，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作为域外国家近年不断介入这一本能通过中国与南海声索国双边对话解决的议题，致使其发生了跨区域延展，呈现升级为全球热点议题的态势。本文旨在对这一现象的形成机理进行剖析。

二 超级安全复合体形成的解释框架

安全议题的地区属性与全球属性矛盾统一为分析南海问题升温提供了新的视角。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是冷战后出现的一种国际安全理论，立足于地区层次对全球各地区的安全现象进行分类和探因，适用于理解地区安全议题的跨区域化现象。基于对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逻辑演绎，本文提炼出“权力关系预期”与“地缘政治想象”两个核心解释变量，并据此提出地区安全议题跨区域化的促发机制。

（一）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视域下的地区安全议题跨区域化

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由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提出，^①是冷战后理解和管理安全问题的概念工具。^②冷战的结束尤其是两极体系的瓦解深刻影响了各地区的安全运行模式，众多地区安全议题突显。该理论采取了物质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混合方法，将地区安全态势（security dynamics）视为国际体系整个安全组群（security

^① 关于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发展历程，参见巴里·布赞著，闫健、李剑译：《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著，朱宁译：《新安全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巴里·布赞、奥利·维夫著，潘忠岐等译：《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

^② 参见Böjrn Hettne, “Regionalism,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Böjrn Hettne, Andras Innotai and Osvaldo Sunkel, eds., *Comparing Regionalisms: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Development*, Houndmills and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p. 1-53; 郑先武：《“安全复合体”与区域秩序建构：一种理论阐释》，载《欧洲研究》，2004年第3期，第38—53页。

constellation) 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地区安全复合体”是该理论的核心概念。鉴于大多数威胁更容易在近距离范围内传播,安全的相互依赖通常会使各行为体之间组成以地区为基础的群体。随着这些地区群体内部的安全互动增强,共同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进程紧密联系,致使它们的安全问题难以被割裂开来分析或解决。这些地区群体间的关系日趋牢固,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全球层次及其他地区的行为体间安全互动和安全化/去安全化进程,进而出现相对独立的安全复合体。^②戴维·莱克(David A. Lake)和帕特里克·摩根(Patrick M. Morgan)在布赞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外部性”概念,强调当某种外部因素对特定区域内的国家构成实际或潜在威胁时,这个独特的地理空间就会由这一共同安全问题联结为一个安全复合体。外部性又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同时影响各利益相关方的成本与收益,任何成员的行动都会对其他成员产生重大影响。^③

从理论视角来看,地区安全议题的跨区域化现象符合地区安全复合体的演进规律。复合体的形成和演变涉及国内、地区、地区间和全球四个层次。本文不探讨国内层次,后三者分别指涉某一地区内的国家间关系、相邻地区间关系以及全球性大国的地区角色,均为地区安全议题跨区域化的主要分析层次。^④地区安全议题的形成起源于威胁的近距离传播,具体由两个阶段组成。首先是地区内部的安全化,即赋予某个特定的安全议题地区属性的过程。其次是地区安全议题跨区域化的阶段,越来越多的域外行为体尤其是实力地位较强的行为体基于自身利益为与其他大国竞争不断借这一安全议题介入本地区事务。安全威胁和安全化进程由此辐射至周边其他区域甚至吸引全球性大国卷入其中,地区间及全球层次的国家互动明显增强。

① 巴里·布赞、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第10—11页。

② 中外学界对“地区安全复合体”的概念做出了多种阐释,本文的定义基于这一概念的提出者布赞等的界定并结合其他学者的定义整理而成。参见巴里·布赞、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第4、43—45、47—48页;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p. 201。

③ David A. Lake and Patrick M. Morgan, “The New Regionalism in Security Affairs,” in David A. Lake and Patrick M. Morgan, eds., *Regional Orders: 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④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Macrosecuritisation and Security Constellations: Reconsidering Scale in Securitisation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5, Issue 2, 2009, pp. 253—276.

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将大国划分为超级大国、体系大国和地区大国三种,^①在此基础上又将安全复合体细分为标准安全复合体、中心化的安全复合体、大国安全复合体和超级安全复合体四类。^② 各类大国陆续介入某一特定的地区安全议题会提升该议题的重要性,使其逐渐显现跨区域特征。在此过程中,权力结构与资源竞争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复合体变革的速度和方向,推动其升级为标准/大国安全复合体并演化为超级安全复合体。由外向内看,大国将资源竞争安全化会导致利益交汇,促使它们介入相关地区以促成超级安全复合体;^③ 由内而外看,超级大国向某安全复合体渗透的难易程度受该复合体权力结构稳定性的影响,多极结构下敌对国家间关系更容易被渗透。^④

近年来,安全复合体在东南亚、东北亚、南亚、欧洲和北美等地区的形成与变迁各具特色,尤以水安全及跨境和边疆安全等议题为热点。在东南亚地区,东盟发挥着重要作用。宋少军认为冷战时期东盟以培育合作型复合体取代冲突,推动了安全共同体的构建。^⑤ 在东南亚地区,中南半岛的水安全是凝聚复合体的热点议题。华亚溪和郑先武将澜湄六国视为多元行为体和多重安全领域互动的“澜湄水安全复合体”,水矛盾的安全化演进分为复合体、利益体系平衡、区域制度与共同体四个阶段。^⑥ 李昕蕾和华冉认为冲突与合作共同推动了不同等级且共存互动的水安全复

① 超级大国具备在整个国际体系中广泛行使军事、政治和经济权力的能力。超级大国几乎在所有地区的安全化和去安全化进程中均能成为积极行为体。体系大国虽无须拥有超级大国那样的能力,也不必参与所有地区的安全化进程,但当其他国家算计本国今后的权力分配时,亦须在体系层次上将这些国家考虑在内。地区大国是指那些在各自地区表现突出但在全球层次上并未引起广泛关注的国家。这些国家能够决定地区安全复合体的极性,也会被迫陷入全球权力的对抗。参见巴里·布赞、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第33—34页。

② 第一类是标准安全复合体,其极性取决于两个或多个地区大国。第二类是中心化的安全复合体,包括以单一超级大国、单一体系大国和单一地区大国为中心的安全复合体以及通过建立区域性制度获得行为体属性的制度安全复合体。第三类是大国安全复合体,其极性取决于该地区的两个或多个体系性大国。第四类是超级安全复合体,是指一个或多个大国通过在某一地区扩张权力、投射利益,使地区间产生高水平、连续性和强有力的安全互动,从而将原本彼此不相干的地区安全复合体集结为以一个或更多大国为核心的超级安全复合体。参见巴里·布赞、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第59—60页。

③ 参见张新平、胡楠:《安全复合体理论视阈下的北极安全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第125—144页;孙天宇:《北极地区安全化与“环北极超级复合体”研究》,吉林大学2020年博士学位论文。

④ 参见孙云飞、刘昌明:《“印太”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形成与美国霸权护持》,载《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12期,第36—47页。

⑤ 宋少军:《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产生、演进与建构》,载《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6期,第108—128页。

⑥ 华亚溪、郑先武:《澜湄水安全复合体的形成与治理机制演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6期,第107—131页。

合体演进。^① 崔庭赫和郑先武将湄公河下游视为从战争前线转变为商业走廊的“区域发展—安全复合体”。^② 珍妮·凯尔 (Jenny Kehl) 以更为普遍的视角将主权独立但相互依存的国际跨境流域国家视为“水安全复合体”，认为软实力而非硬实力的平衡更有助于促成合作。^③ 在东北亚地区，中日韩三国是关键行为体。克里斯蒂安·沃思 (Christian Wirth) 将权力与稳定视为中日韩安全复合体的关键，历史、领土及地缘是凝聚动因。^④ 魏志江等认为中日韩海域安全复合体是在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的过程中由冲突形态向安全机制过渡。^⑤ 在南亚地区，传统安全是地区安全复合体的主要促发因素。苏迪曼将冷战后印巴军事和核军备竞赛导致的权力平衡与安全困境视作南亚安全复合体的成因。^⑥ 在欧洲地区，欧盟扮演了关键角色。钟思雨指出，欧盟在欧洲一体化建构中呈现出安全化与内向性的特征，实际上是在解决内部信任与认同问题的过程中求得发展。^⑦ 在北美地区，身份政治是重点议题。理查德·基尔罗伊 (Richard Kilroy) 等认为安全不平等条件下的身份政治是“9·11”事件后加拿大、墨西哥与美国形成安全复合体的关键。^⑧ 此外，跨境与边疆复合体的研究也补充了这一理论的分析图谱。围绕跨境安全，封顺和郑先武将中缅边境视为“跨境安全复合体”，指出未来两国亟须建立领域更广和主体多元的多边治理机制以应对挑战。^⑨ 陈宇将相邻国家边疆视为“边疆安全复合体”，认为一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互动最具优先性和关键性，业已形成依赖互动的安全格局。^⑩ 上述研

① 李昕蕾、华冉：《国际流域水安全复合体中的安全秩序建构——基于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水冲突—合作事件的分析》，载《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第17—35页。

② 崔庭赫、郑先武：《发展—安全互动演进的区域逻辑：以湄公河下游区域为例》，载《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5期，第119—156页。

③ Jenny Kehl, “Hydropolitical Complexes and Asymmetrical Power: Conflict Cooperation, and Governance of International River Systems,”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Vol. 17, Issue 1, 2011, pp. 218-235.

④ Christian Wirth, “Power and Stability in the China-Japan-South Korea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 Pacific Review*, Vol. 28, No. 4, 2015, pp. 553-575.

⑤ 魏志江、庞加欣、郑响：《中日韩三国海域安全复合体与东海的“安全化”》，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4期，第36—43页。

⑥ Arfin Sudirman, “The India-Pakistani Military and Nuclear Arms Race in Post-Cold War Period: The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in South Asia,” *Global and Strategies*, Vol. 12, No. 1, 2018, pp. 165-181.

⑦ 钟思雨：《欧洲区域安全复合体的安全治理机制：欧洲民粹主义安全化》，载《战略决策研究》，2018年第4期，第40—67页。

⑧ Richard Kilroy, Abelardo Rodriguez Sumano and Todd Hataley, “Security Inequalities in North America: Reassessing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ory,” *Journal of Strategic Security*, Vol. 10, No. 4, 2017, pp. 1-28.

⑨ 封顺、郑先武：《中缅跨境安全复合体及其治理》，载《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5期，第122—145页。

⑩ 陈宇：《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边疆安全复合体：边疆安全的区域和整体视角》，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23—30页。

究多围绕特定地区或时期的复合体形态与演进方式展开，但未基于复合体的变革与聚合现象提出系统性、针对性和普遍性的分析框架。

(二) 自变量：权力关系预期与地缘政治想象

哪些因素会激发特定地区安全议题开启跨区域化进程是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所谓地区安全议题的跨区域化，是指一个区域内部的安全威胁因特定的议题属性、时代背景或显著性质改变导致跨区域外溢乃至蔓延至全球层次，吸引越来越多的体系大国和超级大国参与该议题演进，使得域内外国家间形成紧密安全互动。域外大国围绕特定议题在本国推进安全化进程，以各种方式向议题原属区域渗透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该议题也得到更多域外国家的重视。如此循环往复，致使该议题的敏感性和重要性在全球范围内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跨区域化。地区安全议题跨区域化的进程一定意义上符合大国安全复合体聚合并演进为超级安全复合体的过程。不过，并非所有地区安全议题的跨区域化进程都能从复合体变革的角度进行分析，后文会就此做进一步讨论。

在安全复合体的生成、维系和异变过程中有四个变量在发挥主要作用：一是边界，即基于安全威胁的传播距离，由地理的毗邻性和安全的相互依赖性划定的、将一个地区的复合体同邻近地区分隔开来的界限。二是无政府结构，安全复合体必须包含两个以上的自治单位。三是极性，即基于国家间实力分配区分安全复合体内能够称为“极”的行为体数量，包括单极、两极和多极等。四是社会性建构，安全复合体内各单位间存在的友好或敌对模式，包括冲突形态、安全机制和安全共同体三种。在此基础上，安全复合体的变革也具有内在和外在两种路径。所谓内在变革，是指其内部的无政府结构、极性或社会性建构状态中的一个或多个变量的改变。所谓外在变革，则是指其边界的改变，包括扩张、收缩、一个复合体一分为二或几个复合体合而为一。复合体的内在变革与外在变革可以相互转化，外在变革可能带来复合体内结构的改变。^①

由于国际社会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促使复合体形态变化的因素主要是边界、极性和社会性建构。极性和社会性建构主要诱发内在变革，边界则会导致外在变革。鉴于此，本文基于地区安全议题跨区域化的现象提炼出两个自变量。

第一个自变量是权力关系预期。与特定安全议题相关的若干主要行为体会对彼此间建立的权力关系产生相同或不同的预期，促成复合体的内在变革。行为体对于权力关系的预期不仅受权力关系既存形态的影响，还受行为体对其认知及认可程度

^① 巴里·布赞、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第52、66页。

的影响。前者是客观的物质性因素，外在反映为复合体的极性；后者是主观的观念性因素，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复合体的社会性建构。权力关系预期同时包纳主客观两个层次：首先，若行为体尤其是实力较强的行为体认为围绕特定安全议题建立的权力关系不符合其预期或正朝着有违其预期的方向演变，就可能会介入该议题以尝试改变极性，挑战既有权力结构的稳定性，提升或维护自身在相应议题中的优势地位。其次，若域外行为体对于既有权力关系发起挑战，则很可能促使行为体间关系走向冲突或敌对，影响复合体原有的社会性建构。各方对地区权力关系的预期差异越大，越可能促进复合体的内在变革。

第二个变量是地缘政治想象。与特定安全议题相关的主要行为体会对议题可能囊括的地缘范围产生相同或不同的想象，导致复合体的外在变革。对区域的界定和阐述本就是权力的体现。地缘政治想象是批判地缘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反映特定政治单元对自身、地区和全球的认知，旨在规划世界空间，实施地缘战略图景，并为一国的政治目标和战略诉求提供合理依据。地缘政治想象具有可变性，其对区域的划分不仅限于真实地理边界，也涉及权力和价值构筑的概念性边界。^① 本文引入此概念旨在更为恰切地描述各方对安全复合体边界的认识。若主要域外行为体均将某一地区安全议题覆盖的区域纳入本国的地缘战略布局，均对特定地区产生相同或相似的地缘政治想象，就可能同时对该地区施加影响力。在这一过程中，域外行为体彼此间可能会产生竞争，增加原有复合体边界的不稳定性，诱发复合体的外在变革。

各大国对地区的权力关系预期和地缘政治想象能够促使安全复合体发生聚合。二者的组合可以囊括复合体变革的四种情况（如表1）：第一，当各大国对地区的权力关系预期和地缘政治想象均趋同时，复合体的极性和社会性建构不易改变，但边界容易改变，复合体可能发生外在变革。第二，当各大国对地区的权力关系预期和地缘政治想象均趋异时，复合体的边界不易改变，但极性和社会性建构容易改变，可能促使复合体发生内在变革。第三，当各大国对地区的权力关系预期趋同而地缘政治想象趋异时，复合体的边界、极性和社会性建构均不易改变，此时复合体构型最稳固。第四，当各大国对地区的权力关系预

^① 参见 Gearóid Tuathailand and Simon Dalby, eds., *Rethinking Geo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8, pp. 2-6; Luiza Bialasiewicz, et al., "Performing Security: The Imaginative Geographies of Current US Strategy,"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26, No. 4, 2007, p. 406; John Agnew, *Geopolitics: 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 (2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 1-6; 曾向红、张少文：《从“亚太”到“印太”：批判地缘政治学视角下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载《当代亚太》，2021年第3期，第4—38页。

期趋异而地缘政治想象趋同时，复合体的边界、极性和社会性建构均易改变，内在变革和外在变革可能同时发生，复合体构型会出现显著改变，这是本文重点关注的类型。

表1 地区安全复合体构型的影响因素

各大国对地区的地缘政治想象	各大国对地区的权力关系预期	
	趋同	趋异
趋同	外在变革（边界改变）	复合体构型改变
趋异	复合体构型稳固	内在变革（极性和社会性建构改变）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与此同时，并非所有议题都能促发复合体。域内外国家围绕不同议题的互动、相互依赖和安全化进程也不一定都能达到形成复合体特别是超级安全复合体的程度。本文将议题本身的重要性和地缘互动的相关性作为主要判定标准。一方面，不同层级大国的参与程度是划定安全复合体类别的主要依据。受各层级大国重视尤其是那些可能成为大国竞争导火索的议题更容易被安全化，大国更可能就此建立紧密的安全互动。这些议题更容易成为聚合复合体、促动其升级为超级安全复合体的诱因。另一方面，因复合体本质上是对地理空间架构的描述，能促发复合体聚合的议题本身应具有鲜明的地理属性。各方围绕其开展的安全互动应具备改变各国针对此议题形成的原有地理认知的潜力。

（三）因果机制：复合体聚合与地区安全议题跨区域化

以特定安全议题为内核建立的复合体会在大国权力关系预期趋异、地缘政治想象趋同的刺激下发生变革，升级聚合为囊括多个邻近区域的超级安全复合体。该议题正是在此过程中被更多域外行为体通过渗透和安全化两种机制关注和介入，并将以新形成的安全复合体为依托实现跨区域化延展（如图1）。

一是渗透机制。域外大国主要通过渗透或覆盖两种方式卷入或融入原有的地区安全复合体框架。^①它们深度介入安全热点议题，常态化地参与重要区域的安全机制，在地区权力架构中扮演重要角色，将自身利益与权力拓展和投射至某一地区，

^① 孙云飞、刘昌明：《“印太”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形成与美国霸权护持》，载《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12期，第36—4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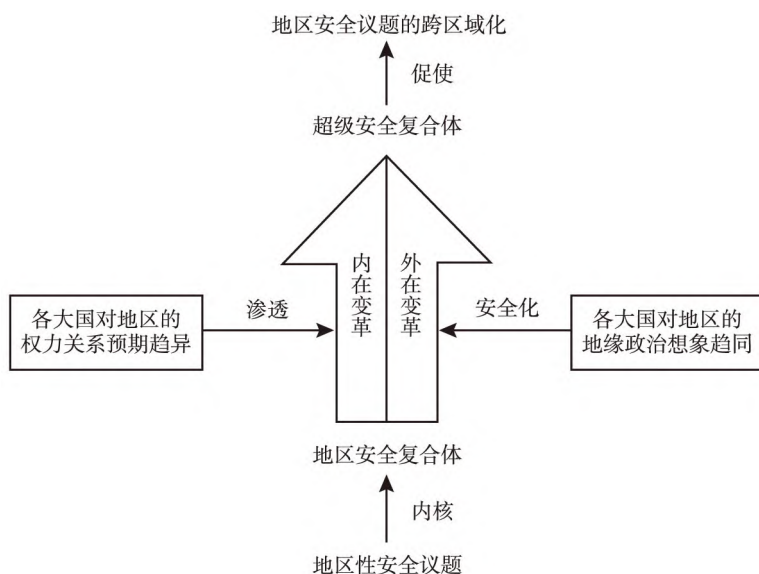


图1 地区安全议题跨区域化的促发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从而将全球大国权力分配的总体结构与地区安全复合体的运行态势相联系。^① 渗透机制会使大国影响安全复合体的极性和社会性建构，从而改变复合体的构型、稳定性和演变方向。大国与安全复合体内部国家建立安全联盟或形成紧密的安全互动是对该地区渗透的传统方式。多个大国在同一地区的军事、经济和话语权等领域竞相渗透是它们开展地区竞争的典型模式。

二是安全化机制。行为体认为某一安全问题会对其构成存在性威胁，这种主体间理解在政治共同体内部以言语和行动的方式动员受众，为采用紧急特别措施加以应对赋予合法性。^② 安全不是既定的，事物是否具备成为安全威胁的属性取决于其是否被一国的决策者视为安全问题并优先处理。^③ 安全化机制在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当特定区域内的行为体随安全化机制的建立形成日益紧密的联系时，相对独立的安全复合体就会逐渐成形。^④

① 覆盖是指大国利益不限于单纯的渗透，达到了主导一个地区的程度，以至于当地的安全关系结构事实上已经停止作用，如欧洲对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殖民以及冷战期间欧洲安全态势遭到超级大国对抗的影响。参见巴里·布赞、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第39、45、48、61页。

② 巴里·布赞、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第473页。

③ 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新安全论》，第13—14页。

④ 巴里·布赞、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第4、43—45、47—48页；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p. 201。

渗透与安全化一体两面，分别基于域内和域外视角描述大国介入并诱使复合体变革的过程。根据安全复合体理论的逻辑假说，冲突的地区模式会塑造全球性大国干预地区安全事务的路径，使它们沿着地区对抗的分界线介入地区，并最终导致地区对抗模式与全球权力模式趋同。^① 本文认为，冲突的地区模式更可能吸引全球性大国干预地区安全事务，激发这些大国衍生出各自参与地区安全议题的路径。同时，大国干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化某些重要地区的安全冲突态势，使其升级、激化和跨区域化，导致原有地区对抗模式逐渐与全球权力格局同频共振。因此，地区安全复合体可以被视为大国与区域互动的中介，二者相互刺激、共同作用、螺旋升级，促发安全复合体变革。

这种螺旋升级在地区安全议题跨区域化的现象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首先，以安全相互依赖为前提，各大国对地区权力关系的预期越趋异，冲突的地区模式越会加剧原有复合体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主要域外大国相互认可度降低，更容易朝着旧的复合体渗透，打破旧复合体的原有构型。其次，以威胁更容易在近距离传播为前提，大国对地区地缘政治的想象越趋同，越可能在本国战略中推进该区域议题的安全化，更容易对该区域形成共同的安全关切，促使区域成员对新边界的界定日趋清晰一致。安全复合体形成的重要动力来源于国家间的安全互动。权力关系预期和地缘政治想象的共同作用导致域外大国渗透或卷入某一特定地区安全议题，打破复合体的原有结构并形成新框架，促发覆盖多个次区域甚至具有全球属性的超级安全复合体的聚合和固化，从而增强了地区安全议题的跨区域化程度。

三 “印太”海洋超级安全复合体的演进路径

冷战结束之初，东南亚地区的安全环境相对稳定，各国虽偶有摩擦，却未发生大规模战乱，形成了“预料之外的和平（exceptional peace）”。^② 此后南海问题渐成地区安全热点，但当时各方围绕南海问题的博弈仅涉及争议海域，行为体仅包含海

^① 巴里·布赞、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第52页。

^② 对于东南亚及更大范围的东亚和亚洲能够长期维持和平局面的研究，参见 Kai He, “Constructing Dynamic Security Governance: Institutional Peace Through Multilateralism in th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udies*, Vol. 8, No. 2, 2019, pp. 141-156; Mark Beeson, “Is the ‘Long Peace’ of East Asia Exception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7, No. 3, 2015, pp. 476-478; Amitav Acharya, “Will Asia’s Past Be Its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3, 2003/2004, pp. 149-164; 张云：《东南亚区域安全治理研究：理论探讨与案例分析》，载《当代亚太》，2017年第4期，第122—151页。

域沿岸存在权益争端的直接利益相关方。然而近 30 年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度迅速提升，它们在南海海域开展所谓“航行自由行动”和联合军事演习，与周边国家高频互动，高调介入南海问题。美国及其盟伴又试图将南海内嵌于其“印太”布局中，作为可能影响全球权力结构的关键和遏制中国快速发展势头的砝码。本文将南海各利益相关方最初的高频互动视为一个次级安全复合体，^①即属于原东南亚安全复合体或东亚安全复合体内部的次区域。随着南海问题重要性的提升，这一次级安全复合体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行为体数量激增。各利益相关方围绕领海主权、航行规则和地缘关系等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安全相互依赖模式。此时的南海各方可以被视为以南海为内核、以中美为两端的大国安全复合体。进入 21 世纪以来，各域外大国的深层次介入致使南海问题发酵，推动原复合体继续聚合。随着美国“印太战略”渐趋成形，围绕南海的地区安全复合体进一步延展，一个以南海海域为内核、以“印太”区域为外延的海洋超级安全复合体初步显现（如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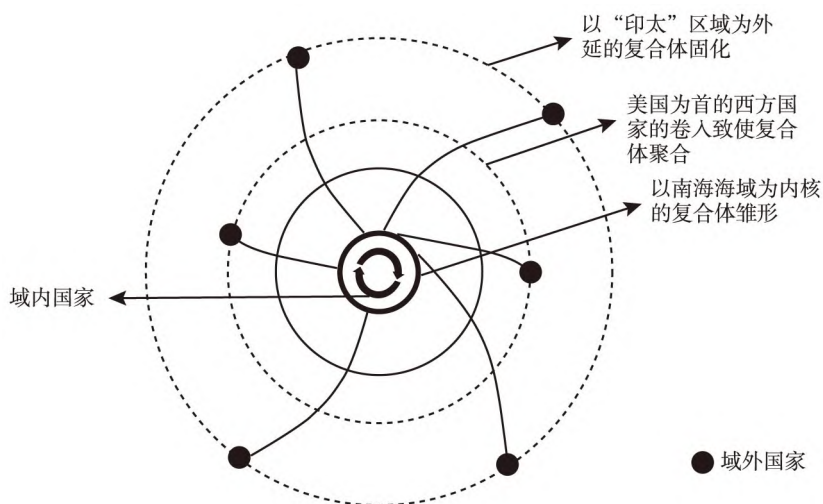


图 2 “印太”海洋超级安全复合体的聚合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一）以南海海域为内核的地区安全复合体雏形形成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开始挑起与中国的领海主权争端，如

^① 巴里·布赞、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第 51、362 页。

1973—1974年中国对越南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1988年中国对越南南沙群岛自卫还击作战、1995—1998年两次中菲美济礁事件、1997年中菲黄岩岛争端。进入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便利了各海域油气资源开发,同时随着联合国海洋法体系的完善和各国领土主权意识的提升,南海各方博弈持续增强。2012年发生中菲黄岩岛事件、2015年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以及近年来中越围绕油气资源和捕鱼问题多次发生摩擦均是南海问题升温的外在表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深度介入南海海域,大肆炒作“航行规则的适用性”等敏感议题,使各方存在的矛盾更趋公开化、尖锐化和复杂化。

可见,由南海问题联系起来的海域周边各方已构成一个地区安全复合体。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相关各方地理位置天然趋近,在领海主权的声索方面存在争议,均将此议题界定为本国的国家安全威胁并将彼此视为导致威胁的诱因。相关各方就此形成消极的安全相互作用,围绕南海问题组成一个次区域组群。随着南海问题的升温,这个次区域组群内部的安全互动增强,各方基于各自国内的安全化进程共同构建起日益紧密的联系,已形成一种持久牢固、无法割裂的群体间关系。这种关系是消极对立且互相刺激的,正在凝聚成一种相对独立的安全复合体构型。

冷战结束以后,东南亚地区处于大国权力真空状态,原有权力关系架构和安全治理模式被打破,新模式却迟迟未能建立。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以争议海域划界、油气资源开发和航行规则适用为代表的议题给各国带来的不安全感在南海周边国家间近距离传播,成为困扰各国的共同安全威胁。^①这种趋势对中国与其他南海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甚至波及中国与东盟的多边合作。以东盟为中心的安全机制虽然能为争议各方提供沟通平台,但鉴于机制化程度不高、效能较低,在推进像南海问题这种区域敏感争端方面收效甚微。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域外行为体也在此阶段相继介入该地区,基于特定区域利益考量加速将南海问题塑造为涉及自身国家安全的议题。各方围绕此议题的消极互动不断增强,安全利益关系越发相互纠缠,与本地区其他机制化合作及双多边互动逐渐产生区隔。南海问题的升温已明显背离东亚地区合作其他领域总体向好的态势,与全球涉海领域日益机制化和法治化的合作大势也不相符。

具体而言,以南海为内核的次区域安全复合体最初的覆盖范围仅涉及南海与该

^① 巴里·布赞、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第148页。

海域周边行为体所处的地理区域，镶嵌于东亚安全复合体内部。该安全复合体虽依托涉海安全议题而生，却早已不再是简单跨越国家边界的海洋区域，而是一个由该议题牵涉各方共同构成、彼此联系日益紧密的特定安全区域，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边界。

（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卷入致使安全复合体聚合扩大

冷战结束之初随着两极格局解体，美国与其他大国对抗性减弱，成为东南亚地区的“淡出国家（lite powers）”，^①该地区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了大国权力的真空状态。直至21世纪第二个十年，美国依托“亚太再平衡”将其全球战略重心重新移向亚太地区。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炒作“中国威胁论”“修昔底德陷阱”等论调，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等亚洲区域大国对中国影响力的提升也存在一定的疑虑，这种国际和区域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驱使域外大国日益深刻地介入亚洲区域热点议题。南海问题原本仅涉及中国与海域周边的部分东南亚国家，美国及其盟伴却大肆渲染南海“自由航行”等议题，将南海与航行规则和秩序塑造等问题挂钩，以此抹黑和打压中国。近年来西方国家不断在南海地区向中国施压，不但加大在南海争议海域开展“自由航行行动”和联合军事演习的频率，^②而且指责中国维护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利益的行为“破坏‘基于规则的秩序’”并“损害地区和平稳定”。^③在此背景下，南海问题牵涉的行为体和议题领域已超出原有范畴，升级为域内外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共同战略聚焦。

美国及其盟伴近年来日益深度和常态化卷入以南海为内核的安全复合体，使这一原本只包含南海周边几个行为体的次区域复合体开始朝向大国安全复合体延伸。地区安全议题的出现源于威胁的近距离传播，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域

^① “淡出国家”这一概念用来描述冷战国际体系中的多数大国由于国内态势的变化而退出在世界热点地区的军事参与和战略竞争的情况。参见 Barry Buzan and Gerald Segal, “The Rise of ‘Lite’ Powers: A Strategy for the Postmodern State,”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13, No. 3, 1996, pp. 1-10.

^② 具体信息可查阅美国国防部发布的统计数据和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SCSPI）网站数据，参见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port to Congress, “Annual Freedom of Navigation Report—Fiscal Year 1999–2022,” <https://policy.defense.gov/Portals/11/Documents>, 访问时间：2023年7月20日；《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https://www.scspi.org/zh>, 访问时间：2023年7月20日。

^③ 参见 Robert Menendez, “The American Role in Asia’s Territorial Disputes: As an Asia-Pacific Nation, the U. S. Has Vital Interests in Helping All Nations Develop a Rules-Based Ord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5, 2013; Lisa Murray, “Australia’s ASEAN Push for ‘Rules-Based Order’,” *Th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March 13, 2018; Dipanjan Roy Chaudhury, “Indo-Nordic Summit: Rules-Based Global Order High on Agenda,” *The Economic Times*, April 17, 2018; “Philippines: Defense Chief Urges for ‘Rules-Based’ Order in South China Sea,” MENA Report, London, July 16, 2020; “Philippines: PH Reiterates Need for Rules-based Order in SCS,” *Asia News Monitor*, Bangkok, July 15, 2020.

外行为体却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量将南海界定为“本国的”地缘关切，推动这一议题在各自国家内部的安全化进程，致使其升温发酵。那些本不属于该地区的域外行为体高调参与这一议题对其施加影响，并与南海周边国家开展高频互动，将自身利益和权力投射至本地区，改变了原有次区域复合体的极性结构和社会性建构属性，影响了复合体的构型、稳定性与演变方向，这些域外国家因此渗透并卷入南海次区域安全复合体中。同时，美国及其盟伴在卷入的时间先后、互动方式和渗透深度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相互竞争关系，均希望在这一地区安全议题的互动中占据有利地位。南海问题由此辐射至更为广阔的陆海地带，越来越多的全球和区域大国之间产生了消极安全互动。原有以南海为内核的次区域复合体范围扩大，以中美作为两端，以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为成员的大国安全复合体显现。

（三）美国以“印太”区域为外延试图推动超级安全复合体固化

美国将“印太战略”的覆盖范围定义为“印度向西，美国向东”，囊括亚洲大陆以及印度洋和太平洋两大洋的地缘政治动态，认为该区域与“美国的自由和繁荣”紧密相连。^①在实际推进中，美国“印太战略”力图依托陆海地缘布局及美国与其盟伴间的战略互动，对中国形成合围之势。南海因天然处于“印太”区域中心而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焦点之一，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等亚太国家与部分欧洲国家也在美国的带动下参与其中，各方安全互动的频率和烈度均有提升。例如，美国在近年来数度派遣航母战斗群在南海开展大规模军演及双多边联演。^②2021年8月，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与美国海军两栖攻击舰“F-35B”舰载战斗机进行交

^①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A Free and Open Indo - 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19/11/Free-and-Open-Indo-Pacific-4Nov2019.pdf>, 访问时间：2023年12月20日。

^② 2020年7月，美国派“尼米兹”号和“罗纳德里根”号双航母编队进入南海，部署120多架飞机，并派遣超过1.2万名军事人员参加在南海争议海域举行的联合演习。参见Ryan Browne, “US Navy to Send Two Aircraft Carriers and Several Warships to South China Sea,” <https://edition.cnn.com/2020/07/03/politics/us-navy-south-china-sea/index.html>, 访问时间：2023年3月20日；Brad Lendon, “US Navy Aircraft Carriers Resume Rare Dual Exercis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ttps://edition.cnn.com/2020/07/17/asia/us-navy-aircraft-carriers-south-china-sea-intl-hnk-scli/index.html>, 访问时间：2023年3月20日。2021年2月，“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和“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赴南海开展联合演训，此举旨在“提高美国海军两大骨干力量之间的协作性及指挥和控制能力”。这是自2020年7月演习以来美国海军再次进入南海海域开展演习，也是美国在拜登就职后的首次南海军事联合演习。参见《美双航母战斗群来南海炫耀武力，外交部：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1rrTOUFtce>, 访问时间：2023年12月11日。

又登舰训练，这是英国航母在首次部署期间第一次与美国军舰合作。^① 在同一月内，德国“巴伐利亚”号护卫舰驶抵“印太战略”覆盖海域开展为期半年的部署，并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展开联合演习，这是德国近 20 年来首次开展此类部署。^②

在此背景下，原先以南海为内核、仅囊括海域周边国家的安全复合体实际涵盖的行为体数量、地域范围和议题重要性等已大为扩展，在美国推动下“印太”区域作为其外延的边界特征初步显现。该复合体涉及的行为体是“印太战略”的各利益相关方，覆盖的地理范围涉及亚洲、太平洋和印度洋，以安达曼海、南海及其沿岸地带作为重点区域。印度洋海域原本是南亚安全复合体的次区域，南海和太平洋西海域则分属东南亚安全复合体与东亚安全复合体的覆盖范围。随着美国及其盟伴不断推进“印太”议题的安全化进程，并出台国家安全战略和“印太”政策相互配合，使原本分属不同安全复合体内部、互不相关的相邻次区域产生了强烈而持久的安全互动。“印太”地缘范围的划定是美国及其盟伴基于对亚太安全议题的高度关切在地区扩张权力并投射自身利益、彼此间产生高频安全互动的反映。这一地缘空间立足于南海问题的内核，依托于“印太”新框架的外延，已具备成为超级安全复合体的基本条件。

在美国实施“印太战略”的背景下，近年来南海问题已形成大国竞争、多国博弈及各议题复杂交织的态势，呈现多层次关系、结构性矛盾与系统性互动并发的特点。布赞和维夫早在 2003 年就提出可能出现一个涵括东亚、南亚和大洋洲的“亚洲超级复合体”，一定程度上是对当下“印太”地缘政治结构的预见。^③ 南海问题及相关的航行与军事演习等议题已成为各方参与地区安全进程的重要着力点。域内外大国的深度介入导致本地区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逐渐增强，各国在安全政策上面临两难选择，无论是积极融入还是置身事外，都可能导致本国处于更加不安全的境地。同时，大国介入地区安全事务的方式也更趋多样，涵盖单独行动与合作结盟等。各国采取的这些意在增进自身安全的做法更容易加剧国家间误解，增强地区安全态势的复杂性。不安全感的与日俱增导致各国以更加消极甚至敌对的方式理解其他国家的行为意图。如果任其发酵，可能使国家间既有的安全困境在“印太”海洋超级安全复合体内部加深，导致

① 《美英开展交叉登舰演练：F-35B 从英国航母起飞，在美国准航母上降落》，<https://mil.huanqiu.com/article/44WcwmFeXGS>，访问时间：2023 年 12 月 12 日。

② 《德国军舰近 20 年来首次启程前往印太部署，专家：代价是毁掉德国海军舰队》，<https://mil.huanqiu.com/article/44CVaxNL7sw>，访问时间：2023 年 12 月 20 日。

③ 巴里·布赞、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第 42—50 页。

大国博弈在这一地区愈演愈烈。

“印太”海洋超级安全复合体的形成大致遵循三条路径：一是边界扩展。在美国及其盟伴推动下，印度洋和太平洋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的联系越发紧密，内部毗邻海域间联动增强，沿岸主要国家产生高水平、高强度和持续性的地区间互动，复合体的外延构型渐趋清晰固化。“印太”这一海洋地理概念也因此被赋予新的地缘经济和战略意涵。^① 2018年5月30日，美国将“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以示将深度介入“印太”事务，深化地区间联系。^② 此后美国多次与相关国家在该地区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巩固其盟伴体系。二是安全文化恶化，原亚太域内各方的合作动能减弱，对抗性日益增强。2019年6月美国发布的第一版《印太战略报告》将印度、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列为其亚太盟友之外的伙伴，将中国、俄罗斯和朝鲜视为“挑战”。^③ 2022年2月美国发布的第二版《印太战略报告》体现出更强的对抗性色彩，指出要通过“一体化威慑”强化美国在“印太”区域的军事存在和作战能力。^④ 大国战略博弈会加深国家间的消极安全互动，加剧他国的不安全感，给南海周边的中小国家带来选边压力。三是“极”数增多。在中美两国之外，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国通过在“印太”海域频繁开展“自由航行行动”及联合军事演习，强化在这一地缘区域的军事存在。美国力图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打造成“印太”地区的首要安全机制。美国及其盟伴试图通过增强在此海域的力量投射和军事存在，提升对该区域事务的参与和影响，成为“印太”海洋超级安全复合体潜在的“极”，这是推动安全复合体演进的关键因素。

四 驱动南海问题升级为全球热点的主要议题领域

近年来，在美国为代表的域外国家的广泛参与及深度介入下，南海问题呈

① C. Raja Mohan, “Donald Trump’s ‘Indo-Pacific’ and America’s India Conundrum,” ISAS Insights, No. 476-13, November 2017.

② James N. Mattis, “Remarks at U. S. Indo-Pacific Command Change of Command Ceremony,” <https://www.defense.gov/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Article/1535689/remarks-at-us-indo-pacific-command-change-of-command-ceremony/>, 访问时间：2023年12月9日。

③ C. Todd Lopez, “Shanahan: Partners Must Join U. S. in Investing in Indo-Pacific Region,” <https://www.defense.gov/Explore/News/Article/Article/1863535/shanahan-partners-must-join-us-in-investing-in-indo-pacific-region/>, 访问时间：2023年12月11日。

④ 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访问时间：2023年12月20日。

现出由地区安全议题升级为全球热点的态势，这一态势以“印太战略”为依托持续发酵和升级。其原因在于，各利益相关方尤其是大国对彼此权力关系的预期越趋异，旧的复合体结构越容易打破；各利益相关方尤其是大国对这一空间的地缘政治想象越趋同，新的复合体构型越容易形成。在这一复杂的国家间群组关系与多议题框架中，可以分离出主权议题扩大化、航行议题政治化以及“印太”议题实心化三个最具代表性的角度。它们是行为体间结构性矛盾的外在表现，能够从不同角度论证南海问题升级为全球热点的具体驱动机制（如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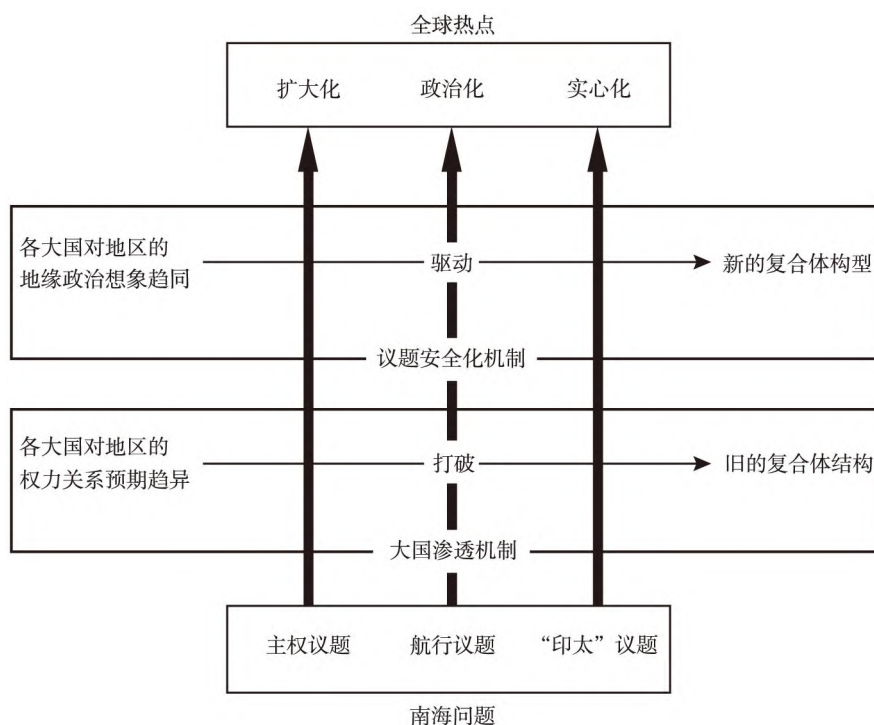


图3 南海问题升级为全球热点的驱动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一）主权议题的扩大化

南海问题本是海域周边国家之间的双边议题，但在当前日益呈现多边化与扩大化倾向。议题首先从几个直接利益相关方外溢至中国与东盟关系层面。以2002年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为基础，双方在2012年的中国—东盟（10+1）

领导人会议上就“南海各方行为准则（COC）”达成共识。此后双方借助“10+1”、东盟地区论坛（ARF）和东亚峰会（EAS）等区域合作平台围绕南海问题开展积极对话，并在2018年的“10+1”外长会议后就“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单一磋商文本草案取得了重大突破。与此同时，虽然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主权划界不涉及其他域外国家，但美国及其盟伴却在国际社会炒作这一议题，导致南海问题的敏感性增强、牵涉其中的亚太及全球大国增加，最终造成其从一个区域主权安全议题向全球安全热点议题扩展。

首先，各大国对主权议题背后的权力关系预期趋异，会侵蚀旧的复合体结构。中国始终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介入南海，美国及其盟伴则力图通过深度介入南海打压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提升。近年来，派遣军舰进入南海海域航行或参与军事演习的域外国家日益增多。这些国家旨在借此向南海渗透势力，策应美国行动，推动南海主权议题背后的地区权力关系架构朝着对自身有利的方向发展。随着南海安全环境趋紧，近年来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开支也不断增长，军费增长率远超全球平均水平，这从侧面反映出南海问题升温给本地区各国带来的不安全感对旧有复合体结构造成了冲击。据统计，东南亚国家的军费支出在2009—2018年增长了至少33%，2008—2017年的武器总量也有所增长，^①这种增长态势增加了现有安全架构的异变可能。

其次，各大国围绕主权议题形成的地缘政治想象趋同，驱动新的复合体构型出现。南海及其邻近海域已成为美国地缘战略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一直将南海及其周边区域视为其势力范围辐射的重点，敌视中国实力在这一空间范围的客观增长。如美国设立了“亚洲海事透明倡议”网站抹黑中国的岛礁建设，^②并多次在国际场合宣称将继续保持在南海海域的军事存在，^③不断强化其对南海的地缘政治想象。其盟伴也在主权议题下配合美国，针对南海海域衍生出各自的地缘政治想象。如日本与澳大利亚等国多次与美国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中国接受所谓“南海仲裁”

① Siemon T. Wezeman, “Arms Flows to South East Asia,”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19-12/1912_arms_flows_to_south_east_asia_wezeman.pdf, 访问时间：2023年12月9日。

② “亚洲海事透明倡议”于2014年前后建立，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设置的一个网站，专门关注中国南海及东海局势。参见“Asia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https://amti.csis.org>, 访问时间：2023年12月20日。

③ 《2021年8月24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901461.shtml, 访问时间：2023年12月20日；《2021年8月25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901762.shtml, 访问时间：2023年12月12日；《中国驻越南使馆就美国副总统访越期间发表攻击中国言论阐明立场》，<http://vn.china-embassy.org/chn/sgxw/t1902135.htm>, 访问时间：2023年12月22日。

结果，在这些国家近年发布的战略与安全报告中频频提及南海，将其视作地缘安全的重点关切。这些表态与行动会促使复合体新构型凝聚，导致议题的复杂程度激增。

上述两个因素共同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南海主权议题纳入本国的外交政策关切，议题的实际覆盖范围向更广阔的空间延展。相关国家为争取自身利益向南海区域渗透，原先以南海为内核的安全复合体开始向“印太”海洋超级安全复合体演进增强了南海问题本身的跨区域化程度，加剧了该议题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对部分南海声索国而言，推动南海问题升级为全球安全热点符合它们的意愿，能够吸引更多大国参与该议题并对中国施压，使其在谈判中最大限度地谋取利益。这种推动议题升级的主观意愿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打通域外国家向南海区域渗透的渠道，使得域内外联动增强，推动以南海为内核的安全复合体向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延展。

（二）航行议题的政治化

航行议题因其天然的低政治性特征，被许多域外国家作为最初介入南海事务的适宜借口。该议题日益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治化，成为它们介入与干涉南海事务的主要方式之一。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助国际话语权优势，以“保护航行自由”为由在南海地区频频发起“航行自由行动”和联合军事演习，加速南海问题升温发酵并向全球范围延展。随着大国博弈的加剧，南海航行议题受到各国意识形态、阵营划分、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念等政治因素的深刻影响，成为南海周边国家与美国及其盟伴介入南海问题的主要着力点。这种航行议题政治化的态势使南海问题更加复杂，在领域上呈现多样化，在地区上呈现联动性，在国家间关系上呈现斗争性。

首先，各大国对航行议题背后的权力关系预期趋异，会动摇复合体的旧有结构。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南海及其周边海域视作自身地缘权力的投射重点，以航行和军事演习等方式实现对该地区的权力关系预期。各国对本地区权力关系预期趋异，越容易走向对抗，也就越倾向于通过抑制他国影响力的方式提升本国在权力结构中的优势地位。以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为开端，美国逐年增加在南海的活动频率，已成为南海军事化的最大推手。尤其是在“南海仲裁案”后，美国舰船驶抵南海开展“航行自由行动”的频次显著攀升。域外国家的高频力量投射使原先仅限于海域周边国家的安全互动从狭小的海域平面维度向海空多维和多层次行为体间的立体维度互动转变。当下南海问题的实质也由最初海域周边各方的主权权益

争端演变为以中美在这一海域的权力博弈为主、东南亚南海声索国参与为辅的新态势，域外大国借机更积极地参与南海权力博弈，希望在乱局中攫取更多利益。南海已成大国权力竞争的试验场，此前以南海为内核且仅包含海域周边几国的复合体初始结构已现异变。

其次，各大国围绕航行议题形成的地缘政治想象趋同，这会驱动复合体的新构型生成。南海是美国开展“航行自由行动”的重点区域之一，近十几年更成为其拓展利益、维系霸权和构筑地缘政治想象的重要依托。美国在“航行自由行动”中强调，“如不质疑，沿岸国过度的海洋权利主张就可能侵犯美国享有的海洋权利、自由及对海洋的合法使用”。^①自1991年起，美国国防部以财年为单位定期公开发布年度《航行自由报告》，列举每年美国船只航经他国领海、专属经济区与主权争议海域时，这些国家发表的质疑或抗议的内容和频次。可见，南海航行议题在美国国内已被深度安全化。美国近20年的《航行自由报告》反映出“航行自由行动”在南海的负面影响。^②21世纪头十年中国的抗议次数较少（每年2次或以下），2011年后开始增长。在2016年“南海仲裁案”后，中国的抗议次数显著攀升，2017年有6次，2018—2020年每年均达7次，成为自《航行自由报告》发布以来单年抗议次数最多的国家。2021年中国的抗议次数为5次，虽略有下降，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较多。可见，中美两国均将南海视为重要战略关切，地缘政治想象深度重叠，博弈烈度持续升级。与此同时，东南亚多国也经常对“航行自由行动”提出申诉，反映出美国基于自身对此海域的地缘政治想象进行的影响力扩展与东南亚国家在此海域的固有力量之间也存在矛盾。以“航行自由行动”为样板，印度、英国、法国和德国等美国盟伴也将南海视为其地缘关切，加强了对这一海域的力量投射。如印度在南海附近的安达曼—尼科巴群岛频繁修建军事设施，设置三军司令部，将其“东向政策”与“印太战略”对接，多次在国际场合强调“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如前所述，欧洲国家也频频派遣军舰至南海参与“航行自由行动”和相关军事演习，美国及其盟伴在南海的航行极大地推动了安全复合体新构型的聚合。

上述两个因素共同导致更多域外大国深度卷入南海航行议题，将这一本来无关其核心利益的议题视作重点战略关切，围绕其开展的安全互动也显著增强。

^①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port to Congress, “Annual Freedom of Navigation Report—Fiscal Year 2018,” <https://policy.defense.gov/Portals/11/Documents/>, 访问时间：2023年12月25日。

^② 参见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port for Policy, “DoD Annual Freedom of Navigation (FON) Reports,” <https://policy.defense.gov/OSDP-Offices/FON/>, 访问时间：2023年12月20日。

这一议题因此成为大国划分政治阵营、稳固同盟关系以及排挤打压对手的工具和筹码，政治化色彩日渐鲜明，跨区域化程度显著提高。这一典型的安全化进程是复合体形成与演进的主要动力，使各方矛盾纠葛加深，渲染出地区安全文化的斗争性。首先，各国的不安全感增强改变了复合体的社会性建构。各方在南海海域开展“航行自由行动”强化了地区安全态势的不确定性，使相关国家间关系朝着更具斗争性和对抗性的状态转变。其次，更多域外大国被该议题吸引，深度卷入地区层次的国家间互动，成长为复合体内新“极”的可能性加大。相关国家效仿美国增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巩固自身的区域影响力。最后，参与南海航行议题的域外大国往往具备较强的安全议题设置能力，能够大大拓展复合体的原有边界。这些外部力量会共同推动打破复合体旧有结构，并向超级安全复合体的方向演化。

（三）“印太”议题的实心化

对“印太”议题的操作反映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亚洲安全局势进行地缘整合的企图，其牵涉亚洲、太平洋与印度洋地缘布局的解构与重构，对未来国际与地区秩序的维系和重塑具有深远影响。南海问题是“印太战略”的重点关注领域，域外国家将“印太”议题纳入本国的安全战略并立足各自的国家战略利益积极介入其中，导致“印太”议题更趋实心化。

近年来，美国多次在国际场合阐释“印太战略”构想，于2021年1月12日公布《印太战略框架》。在2022年2月11日发布的第二版《印太战略报告》中，美国进一步强调会充分利用“印太”的五组既有双边军事同盟及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依托东盟、欧盟和北约等组织推进“印太”区域的联通与联动。与此同时，美国着力丰富“印太”议题的地缘权力意涵，计划通过“太平洋威慑倡议”和“海洋安全倡议”强化对这一地区的军事威慑。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部分欧洲国家顺应美国主张，陆续将“印太”议题纳入本国战略考量。^① 2017年11月，美国与日本提出共建“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围绕这一议题的政策一致性增强。^② 此后日本的“印太构想”与美国的“印太战略”由异趋同，将共同应对

^① C. Todd Lopez, “Shanahan: Partners Must Join U. S. in Investing in Indo-Pacific Region,” <https://www.defense.gov/Explore/News/Article/Article/1863535/shanahan-partners-must-join-us-in-investing-in-indo-pacific-region/>, 访问时间: 2023年3月20日; 林民旺:《“印太”的建构与亚洲地缘政治的张力》, 载《外交评论》, 2018年第1期, 第16—35页。

^②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APEC CEO Summit, Da Nang, Vietnam, November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apec-ceo-summit-da-nang-vietnam/>, 访问时间: 2023年12月20日。

“来自中国的挑战”作为主要指向。^① 印度于2018年6月召开的第十七届亚洲安全峰会上将其“印太战略”阐述为“自由、开放、包容”和“不针对任何国家”。^② 澳大利亚在其国防与外交方面的官方文件中多次使用“印太”概念，强调构建安全、开放和繁荣的区域。法国的官方文件多次强调其在“印太”地区的领土主权、战略供应及专属经济区的广泛安全利益，计划在此地区发挥软权力。^③ 2021年4月，欧盟发布“印太战略”文件强调多边合作，旨在促进欧盟在“印太”的经济及战略影响。^④ 2021年9月25日，“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首次线下峰会在华盛顿召开，美日印澳四国宣布致力于打造一个“自由、开放、包容、有韧性”的“印太”地区，强调东盟是“印太”的核心，并对欧盟于2021年9月发布的《印太合作战略》表示欢迎。^⑤

首先，域外大国对“印太”议题背后的权力关系预期趋异，会打破复合体的旧有结构。“印太战略”可以被理解为由美国主导、由美国“印太”盟友共同组成的、针对中国建立的综合性地缘包围圈。作为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天然地理枢纽，南海在这种地缘权力结构的调整中面临直接压力。过去围绕南海问题业已形成的以东盟为中心、以“双轨思路”为原则的多边安全机制在更大范围的“印太”地缘竞争的冲击下面临挑战。美国的盟伴也以南海问题为借口加强对“印太”区域的军力投射，力图在这一地区的力量格局中发挥更大影响。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通过加强在亚洲、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远程导弹与反导系统部署，抵御地区权力关系异变带来的不安全感。当前中美等大国对于自身及对方在亚太区域中的角色尤其是彼此之间的权力等级关系的认知分歧增大，造成区域权力结构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显著增强。美国的盟伴借此契机深度融入既有的亚太区域秩

① 外務省「日米首脳共同声明「新たな時代における日米グローバル・パートナーシップ」」，<https://www.mofa.go.jp/files/100181507.pdf>，访问时间：2023年12月15日。

② Prime Minister's Office, Government of India, "PM Modi's Keynote Address at the Shangri-La Dialogue in Singapore," <https://www.narendramodi.in/pm-%20modi-%20to%20-deliver%20-keynote-%20address%20-at%20-shangri-la-%20dialogue-%20in%20-singapore-540324>，访问时间：2023年12月30日。

③ Ministère des Armées, "France's Defence Strategy in the Indo-Pacific," <http://www.defense.gouv.fr/content/download/558932/9676351>，访问时间：2023年12月20日；Ministry for Europe and Foreign Affairs, "France's Indo-Pacific Strategy," https://www.diplomatie.gouv.fr/IMG/pdf/en_dcp_a4_indopacifique_022022_v1-4_web_cle878143.pdf，访问时间：2023年12月22日。

④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Council Conclusions (16 April 2021)," <https://data.consilium.europa.eu/doc/document/ST-7914-2021-INIT/en/pdf>，访问时间：2023年12月22日。

⑤ "Joint Statement from Quad Leaders,"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24/joint-statement-from-quad-leaders/>，访问时间：2023年12月24日。

序，助力美国对地区权力关系的重塑。例如，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均希望成为“印太”框架内除美国外最重要的国家，彼此间存在潜在竞争关系。印度以“印太战略”的关键变量自居，认为自己的合作意愿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印太战略”的成败。^① 日本秉持“海上现实主义”，强调“民主价值”，积极扩大自身在“印太”海洋地理空间中的主导作用。^② 正在形成的“印太”地缘架构也在冲击着该区域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框架，对冷战后东盟在地区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带来了挑战，^③ 东南亚面临重新沦为地区权力结构边缘地带的风险。当前，美国及其盟伴已深度参与以南海问题为代表的“印太”安全议题，促使“印太”海洋超级安全复合体加速形成。

从地区机制互动的角度来看，在南海问题跨区域演进并导致“印太议题”实心化过程中，美国及其盟伴的双边和小多边安全机制还会对以东盟为中心的既存区域合作架构以及由中国主导或倡议建立的各类双边和多边机制构成冲击。同时，这些机制也与“东盟中心”的区域架构存在对接、互补和竞争的现象。美国拜登政府注重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利用各类双边和小多边安全机制营建盟伴体系。南海问题的存在为这些机制的聚合和加固提供了借口，导致地区安全格局面临新一轮变革。其内容包括加深美日、美澳、美印和美菲等双边盟伴关系，加速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成形和升级，构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推动“印太”区域“北约化”和北约“印太化”等。在此过程中，美国以“盟中之盟”的阵营化方式，强调通过“巧竞争”方式构筑多圈层安全机制全面介入南海事务，推动美国“轴辐”双边同盟体系的扩展，增强各方应对“中国威胁”的一致性、协调性和联动性。^④ 东盟主导的地区合作机制在这一过程中受到明显挤压，“印太议题”的实心

① C. Raja Mohan, “Donald Trump’s ‘Indo-Pacific’ and America’s India Conundrum,” *ISAS Insights*, No. 476, November 13, 2017.

② Takuya Matsuda, “Explaining Japan’s Post-Cold War Security Policy Trajectory: Maritime Realism,”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4, No. 6, 2020, pp. 687-703.

③ Hoang Thi Ha, “Evolving Regionalisms in Asia-Pacific,” *ASEAN Focus*, Vol. 22, Issue 3, 2018, pp. 2-3; Malcolm Cook, “Indo-Pacific Ushers in a New Era of Post-Modern Regionalism,” *ASEAN Focus*, Vol. 22, Issue 3, 2018, pp. 4-5; Tang Siew Mun, “ASEAN’s Hard Look at Indo-Pacific,” *ASEAN Focus*, Vol. 22, Issue 3, 2018, pp. 6-7.

④ 参见赵明昊：《盟伴体系、复合阵营与美国“印太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6期，第26—55页；王联合：《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下针对南海问题的联盟新样式》，载《国际观察》，2021年第1期，第106—130页；吴心伯：《拜登执政与中美战略竞争走向》，载《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2期，第34—48页。

化加速发展。^①

其次, 各大国围绕“印太”议题形成的地缘政治想象趋同, 会促成复合体的新构型。近年来, 随着南海问题的升温和“印太战略”的成形, 美国及其盟伴均聚焦于该区域构建地缘政治想象。美国长期将印度洋与太平洋作为地缘权力的“首要运作地区”,^② 近年来更是将两洋视作整体, 其地缘政治想象从“亚太”向“印太”转变, 尤其试图以“半嘴形包围”压制中国的地缘施展空间,^③ 推出“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计划 (IPMDA)” 以实现海域安全数据积累、战场建设和战争准备,^④ 通过通航、经贸和开展军事演习等方式整合原有布局打压中国, 维系自身霸权。以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等为地区大国的南亚、东北亚和南太平洋原本是各自独立的次区域, 但在“印太”议题下围绕南海地区的安全互动不断增强。印度以“多面结盟”参与地区涉海机制建设, 通过主导或深度参与海上联合军事演习, 成为“印太”框架核心;^⑤ 日本不断强化既存的美日同盟机制, 希望将之打造成支撑“印太”地缘框架的制度基石;^⑥ 澳大利亚将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描绘为美国在“印太”区域的“南锚”和“瞭望塔”,^⑦ 力图借机强化美澳军事同

① 参见田诗慧、郑先武:《关系性权力与亚太海洋安全合作“东盟中心地位”构建》,载《当代亚太》,2022年第6期,第98—133页;吴琳:《中美制度竞争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冲击——以东盟地区论坛(ARF)为例》,载《外交评论》,2021年第5期,第88—117页;王亚军:《亚洲安全治理转型的历史分析与趋势展望》,载《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3期,第3—22页。

② C. Todd Lopez, “Shanahan: Partners Must Join U. S. in Investing in Indo-Pacific Region,” <https://www.defense.gov/Explore/News/Article/Article/1863535/shanahan-partners-must-join-us-in-investing-in-indo-pacific-region/>, 访问时间:2023年12月25日。

③ 曾向红、张少文:《从“亚太”到“印太”:批判地缘政治学视角下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载《当代亚太》,2021年第3期,第4—38页。

④ “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计划”以“与区域伙伴合作应对人道主义、自然灾害和非法捕鱼”为目标,依靠位于印度、新加坡、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四个信息融合中心获取的信息,基于卫星数据实现海上信息共享,将全球范围内跨部门、跨国家、跨地区的卫星和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及移动军警船舶雷达监测等在内的信息情报进行整合,从而为美军应对未来在南海可能的冲突积累实战经验与数据,通过实操演练加快针对南海的战场建设和战争准备。参见胡波:《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计划与南海局势》, <http://www.scsipi.org/zh/dtfx/1677319583>, 访问时间:2023年12月25日。

⑤ 高刚:《“印太”概念与莫迪政府的印太外交实践》,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0年第3期,第30—48页。

⑥ Takuya Matsuda, “Explaining Japan’s Post-Cold War Security Policy Trajectory: Maritime Realism,” pp. 687-703.

⑦ Department of Defence, “2016 Defence White Paper,” <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Docs/2016-Defence-White-Paper.pdf>, 访问时间:2023年12月22日;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 <https://www.fpwhitepaper.gov.au/file/2651/download?token=Q5CYuX29>, 访问时间:2023年12月22日。

盟。此外，东盟也提出了自身版本的“印太”地缘政治想象。《东盟印太展望》旨在改善地区互联互通、增进海上合作，使东盟在“印太”区域发挥主导作用，并力图将其领导的既有地区安全机制打造成区域合作平台，为可能发生的地区冲突提供和解路径。^①可见美国及其盟伴和东南亚国家当前均将这一地区视作自身施展影响力的主要目标，聚焦于南海及其周边海域的地缘政治想象在这一地区交错堆叠。这导致过去仅基于南海周边国家的安全互动建立的复合体被打破，海域周边各次区域的联动性增强，“印太”作为一个更大范围安全复合体的边界轮廓渐趋清晰。

上述两个因素共同导致更多域外大国深度卷入“印太”议题，彼此间的安全相互依赖增强，以南海海域为内核、以“印太”区域为外延的海洋超级安全复合体初步成形，南海问题的跨区域化程度进一步提升。相关大国将“印太”议题视为本国战略关切，不断丰富、发展、定义和阐释各自版本的“印太”构想，推动该议题从初提时的务虚框架向实心化方向发展。在这些国家看来，南海问题是“印太”议题中的重点，因而成为其推进各自“印太战略”的主要发力点之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是通过渲染“印太”议题在区域内扩张权力，深度介入地区安全事务。与此同时，复合体的变革也加剧了各方既有利益摩擦和安全困境，导致南海问题的跨区域化程度进一步增强。这种态势促使原有复合体朝着包纳更多大国、安全相互依赖更紧密、国家间关系更敌对以及安全边界更广阔的方向演变，导致“印太”区域的边界、利益相关方和关涉议题更加多元，实心化趋势日益显著。尽管如此，当前各方对“印太”区域的架构、权力关系和机制化程度等方面的界定仍不明确，这一海洋超级安全复合体的未来趋势仍有待观望。

五 结论

南海问题既是中国周边安全的焦点，又是当前美国“印太战略”布局的关键领域。在当下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更显复杂紧迫，对中国周边安全态势具有重要影响。目前以南海海域为内核、以“印太”区域为外延的海洋超级安全复合体已经初步形成。这既是特定区域各利益相关方的互动发酵升级至全球层面的反映，又是全

^① “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 <https://asean.org/asean-outlook-on-the-indopacific/>, 访问时间: 2023年12月25日。

球性大国深度介入区域安全议题的典型体现。

沿袭布赞的范式，本文围绕地区安全复合体何以变革这一问题，尝试将相对静态且长于类型化分析的复合体理论进行动态化发展。本文提炼出大国的权力关系预期和地缘政治想象两个变量，将二者与安全复合体结构的破旧立新建立因果关系，由此描摹出地区安全议题跨区域化的演进路径。在实证层面，本文尝试突破布赞对于“亚洲超级安全复合体”的框定，以范围更加广阔的新视角认识中国周边安全。

南海问题在大国博弈加剧的时代背景下正逐渐升级为国际安全热点。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近年来将主权、航行和“印太”等议题互促迭代，着力向中国施加舆论压力，激化南海问题在国际社会升温发酵；另一方面，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体现出对南海问题降温处理的倾向，更希望以平和理性的态度探求其化解之策。针对这样的情势，中国首先可着力推动议题的分解和降级，将其细化为海洋权益、经贸往来、航行安全、军事合作和人文交流等具体领域，在各领域建立独立机制，有针对性地解决治理问题，避免各领域叠加杂糅而导致矛盾的激化。其次应建立中美两国围绕南海的危机管控和制度化磋商框架，畅通双方战略沟通渠道，增进互信，着力维护南海局势的总体稳定。

(截稿：2023年8月 责任编辑：郭 梟)

ners, minilateralism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ideal types: the hybrid model, the security model, the institutional model, and the status quo model. Wh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have the same vision of order, if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strong “perception of threat” toward China, this scenario will lead to the formation of a hybrid model, and its “decoupling” intensity from China is also the highest. Wh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have the same vision of order, if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weak “perception of threat” toward China, this scenario will lead to the emergence of an institutional model, which has a higher degree of “decoupling” from China. Wh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have different visions of order, if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strong “perception of threat” toward China, this scenario will lead to the formation of a security model, and its “decoupling” intensity from China is at a medium level. Wh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have different visions of order, if the “perception of threat” is weak, this scenario will lead to the emergence of a status quo model, which has the lowest level of “decoupling” from China. The strategies toward China adopted by the Obama, Trump, and Biden administrations and their related cases can verify the causal mechanism generated by the US “Indo-Pacific” minilateralism.

【Key Words】 minilateralism, vision of order, perception of threat,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institutional formation

【Author】 Ye Xiaodi, Research Fellow in th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The Aggregation of the “Indo-Pacific” Maritime Super Security Complex

Fan Jiarui (127)

【Abstract】 Recently,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has become a hot topic around the world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This phenomenon has triggered widespread concern of major actors i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Pacific Ocean, Southeast Asia,

Northeast Asia and South Asia, with sovereignty and navigation as the key areas, i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me other global powers are play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s, making the regional security situation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Based on logical deduction of the theory of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is phenomenon shows that a maritime super security complex has initially taken shape, with the South China Sea as its core and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s its extension. There are two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s. The first one is the expectation of power relations. and the second is the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 of various countries.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 more different the former becomes, as well as the more consistent the latter shows, the more likely the regional security issues are to extend across regions. This situation spirals and twists with the trend of intensified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powers, and reflects the upgrading of security interactions within all parties in a specific region to the global level, as well as a case of world powers deeply involved in regional security issues. There are three representative issues that promote the initial formation of this maritime super security complex, namely the expansion of sovereignty issue, the politicization of navigation issue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Indo-Pacific” issue.

【Key Words】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maritime super security complex, international security, major power competition

【Author】 Fan Jiarui,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